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78期

2013年2月25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与中国的应对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锋

中美关系变成战略竞争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简单地埋怨美国的霸权逻辑对我们审视和应对这一关系无益。中美的战略竞争虽然给中国捍卫主权、安全与发展这三大核心利益带来了新的战略压力，但通向未来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中国手中。中国能否尽快做好准备、提升战略规划和政策应对能力，理性而又务实地规划和执行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主动、积极和建设性地塑造东亚安全的新秩序，这对重建中美两国战略互信，在竞争中增进合作，在合作中规范竞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是否能主动求变，加速自身观念、心态和体制的转变，正在成为塑造东亚未来安全秩序的关键因素。

一、中美两国是战略竞争者，但并非注定是敌人

中美可以是战略竞争者，但中美并非注定是敌人。在迎接中美战略竞争这一新阶段时，中美两国都需要深化这种“非敌”的意识和信念。这是防止中美关系造成东亚地区安全动荡、甚至出现地缘政治分裂的关键。

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关系。这一关系的复杂性不仅仅是“主导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两国国内的竞争性政治、观



念和利益因素，常常让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变得模糊而又富有争议性。中美对彼此的战略动机和意图都抱有深深的疑虑，这并不奇怪。然而，中美不应该互相为敌。一个崛起的大国以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大国为敌，本身便会成为一种战略错误。而主导性大国如果非要把崛起大国“逼成”敌人，更是时代性的错误。1990年代，中美在台湾和人权问题上尖锐对立时，中国人经常告诫美国，如果美国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敌人。今天，中国人需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美国当成敌人，美国真的就可能变成中国的敌人。难道中国需要制造这样的敌人吗？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中美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论述，应该成为中国今天对美政策思考的主流话语和主题。这同样也是中美两国建设和践行“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之所在。

战略竞争关系的特殊性在于，中美两国的强力部门，例如军队、情报系统和国内维稳部门，都会依据“最坏的可能性”来遂行各自的任務。但这并不等于两国的政府和人民需要全面敌对。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的社会关系是一致的。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者”关系非常普遍。有利益的角逐，就一定有猜忌和争斗，就一定有相互之间的防范。但如果把“竞争者”都当成敌人，不仅将造成恶性竞争、激化冲突，更有可能让我们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中美关系变成东亚地区影响力之间的竞争关系，本身是中美变化了的实力和利益的结果。但如果坚持中美“是敌人”的信念，才是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真正可怕之处。今天，中美在东亚一系列海疆及领土争议问题上的对立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两国坠入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便不能排除。

二、加强中美两国在处理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

在稳定和推进东亚热点问题的缓和与解决的进程中，中美既有竞争的一面，更有互利合作的一面。中美两国能否在竞争的同时，加强两国在促进地区安全冲突性问题的缓和与解决进程中的相互协调与合作，对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能否得以积极引导、管理风险、避免误判和提升战略互信，将发挥关键作用。

即便中美关系中存在着越发明显的战略竞争态势，但彼此都愿意从东亚地区稳定、和平与繁荣中获益的现实，同样决定了中美在强化地区稳定、消除朝鲜半岛核扩散、阻止日本右翼政治的极端政策动向等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合作利益。

对于日本未来的战略动向，中美两国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遏制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对东亚安全秩序的挑战。奥巴马政府不同意安倍政府“实行集体自卫权”、要求日本不要对中国飞机发射警告信号等行动，至少说明在阻止钓鱼岛危机升级

问题上中美具有共同利益。

同时，在东亚安全稳定与合作的进程中，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建设性互动至关重要。因为目前的钓鱼岛和南海争议而否认美国存在的积极意义，或者只是功利性地追求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联美反日”都是战略上的短视行为。“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国”。落实中国领导人这一观念的关键，是能否为今后的中美日稳定而又合作性的关系寻找到新的基础和路径。简单地把美国视为中国周边各种问题背后的“幕后黑手”的心态，同样只会误导中美战略竞争。因为争议性问题而将美国越来越视为亚太地区“多余存在”的心态只会加深美国对华疑虑，被视为中国想在亚太称霸。而朝核问题的解决，更是离不开中美合作。

三、中美在亚太地区的“非对称性”竞争决定了中国应该追求有限的目标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依然还是一场相当程度上极为显著的“非对称性”的竞争。中国将长期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美国在亚太地区广泛的战略存在和动员能力，将使得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反应—再反应”过程中长期处于主动和优势地位。换句话说，中国未来在守护自身核心利益时所采取的外交和战略推进的力度有多大，就可能在中美没有协商共识的争议点上招致美国同样力度的战略抑制。中美在亚太战略竞争的本质不仅取决于彼此的军事力量对比，更取决于彼此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和战略资源的动员能力。

这是中美之间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美国作为东亚传统的主导性国家在东亚通过长期战略、军事与经济存在纽带而保持的历史、社会和价值纽带所决定的。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权力和财富格局中的“后来者”，不可能只凭借经济影响力的扩大而取代美国的影响力，更无法短期内扭转战略竞争的被动态势和在地区安全结构中所处的次要位置。从二战前、二战期间一直到二战后，数代美国人付出巨大的鲜血、生命和财产代价在东亚所积攒起来的影响力，不可能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在短期内被动摇。

正如新加坡前资深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所言，未来东西方之间应该融合。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应该给以中国崛起为代表的东方留出位置，但中国如果想要取代美国和西方的优势，恐怕也是幻想。单纯从GDP指标出发看待中美力量对比在显著缩小的认识，掩盖了中美战略能力对比依然存在着的巨大差距，只会误导未来的中美关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在综合实力和战略能力上的对华领先优势难以有实质性的缩小。即便今天美国面临着财政赤字高涨、联邦政府预算削减等许多困难，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财政能力和国防开支将



从此一蹶不振。为此，中国政策界和学术界要对中美力量对比保持清醒头脑。如果以同盟国数量作为衡量大国的战略影响力和资源动员力为标准的话，中美之间更是处于完全不对等的地位。美国今天在全球拥有 64 个同盟国，而中国最多只有表面上的 1 个。

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也需要破除在战略竞争中“唯实力论”的迷思。未来决定中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主要因素，除了力量对比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战略规划、执行和运作能力，即中国在崛起进程中面对不同问题和挑战是否具备有效化解和合理处置的能力，更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断更新自我体制、观念和政策有效性的能力。不管国家有多强大，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倘若无法妥善解决强大过程中遭遇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将无法真正实现强大。因此，相信“只要中国强大了，各种国际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应追求有限的目标，不能急于一味按照自身意愿来推进领土争议以及海洋权益问题上的解决方案，更不能将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简单化为僵硬的教条。相反，让中美关系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注重斗争与妥协相结合、“谋势”与“谋利”相结合，中国才能真正在东亚区域安全的未来格局中赢得更多的主动。

目前，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都希望看到中美两大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可以给该地区内的中小国家“腾留”出重要的战略空间，让它们成为中美进行地缘战略竞争时都不得不去“拉拢”的伙伴，有利于地区内的这些中小国家从大国那里获得更多的尊重、援助和外交资源。但它们也期待中美合作，期待中美关系有利于地区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如果中美出现直接的军事冲突或者由于两国的对立而导致地缘政治出现分裂，那不仅将严重打击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更将迫使大多数地区内国家不得不“选边站”，这并不符合它们的实际利益。面对这一东亚区域政治的现实，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必须兼顾地区内多数国家的利益需求，必须能继续有利于东亚地区各国向往稳定、繁荣和发展的愿望。任何旨在为了“战胜对手”而设定的战略，都必将加剧地区安全局势的严重对立，从而最终失去区域内多数国家的支持。

编辑：侯颖丽 审核：王缉思
网址：www.ciiss.pku.edu.cn
邮件地址：CISS@pku.edu.cn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电话：86-10-62756530 传真：86-10-62759302